

从数字经济看浙江的科技创新

——访北京大学教授梅宏院士

本报记者 潘如龙 章 忻

高端访谈

浙江省委近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浙江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需要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坚实基础。如何发挥浙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报专访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前理事长梅宏院士。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提出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浙江如何继续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激活发展新动能?

梅宏:过去几年,我和浙江一直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深度参与了在浙江落地的三件事。第一,2017年,北京大学和浙江省合作建立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我在北大的团队负责筹建研究院下的智能软件中心,我担任中心首席科学家,统筹北大软件技术领域成果在浙江的落地转化。第二,2020年,和嘉兴市合作,我参与筹建了在嘉兴的南湖实验室,有5个院士团队加盟并设立研究中心。第三,2021年,我作为时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推动了中国计算机学会与东阳的合作,在横店建设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博物馆”,预计将于2026年正式开馆。中国计算机学会将把博物馆作为推动全国范围内计算机领域科普工作的总部。

通过这些年的合作,我对浙江有了更深的了解。浙江原来的科技优势并不突出,教育资源发展也不够均衡。但浙江抓住了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机遇期,随着若干互联网平台企业落地杭州,极大推动了浙江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激活了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发展动能。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互联网经济是数字经济中“数字化产业化”部分的重要构成成分。可以说,浙江在数字经济领域是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恰好证明,科技创新能为区域发展带来新优势,特别是高端科技人才汇聚的优势。我认为,对浙江来说,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发挥既有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特别加大力度发展“产业数字化”部分。过去几年,浙江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数据惠民方面成效显著。未来,需要加强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对促进科技创新,我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坚持对科研组织机构的研发投入,不断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浙江过去一段时间引进和自建了不少新型科研机构,这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科技创新能级,这些机构也为浙江的科

技研发和科技人才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续还需要更好地发挥这些机构的科技创新和“筑巢引凤”作用。二是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为这些机构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土壤和空间。科技创新是不能指望一蹴而就的,机构的成长更是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坚守既有的初心,保持足够的耐心,满怀对彼此的信心,一张蓝图绘到底。半途而废,浪费更大。

对促进产业发展,须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民营经济是浙江的“金名片”,民营企业是浙江区域和企业创新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推动浙江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不断上新台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制造业占了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大的比例。当前,我们要借助科技创新助力民营经济做好数字化转型,以此激发民营经济的新动能。也即是说,需要写好浙江省数字经济文章中“产业数字化”这个下半篇,这样,浙江将可能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复现类似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辉煌。反过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会为科技创新提供环境、舞台、活力和经费支撑,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总体来说,我对浙江的科技创新充满了希望,期待浙江在加快培育创新文化、厚实创新土壤、营造创新环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上做出新的成绩。浙江庞大的民营经济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沃土,夯实了底座,本身也充满了活力。我特别期望看到,我国善于顶层规划设计的制度优势和民营经济自下而上创新的市场优势能够在浙江实现更完美的结合。

着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正如您所说,数字经济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近年来,它也成了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您认为,浙江如何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梅宏: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源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正处于成型展开期,其主要特征是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未来几十年,我们将经历一场由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无论是将其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还是将其视为对工业社会的颠覆性变革,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逆转之势。我们已经站在信息社会的门口,并将走向数字文明。面对这一发展趋势,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都要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准备,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

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制造业仍会对浙江经济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浙江要持续不断地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培育新兴产业。一方面,浙江要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来看,到本世纪中叶,信息技术仍是技术创新的热门领域,甚至是核心区

域,因此,新兴产业一定也与信息技术息息相关,信息技术在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其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将不断催生新业态。另一方面,生命健康产业也将是一片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蓝海”。健康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加持和赋能,需要现在就下功夫打好未来健康产业发展的基础。

另外,浙江的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仍有广阔空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提出要提升平台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人类极大地突破了沟通和协作的时空约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依托开放的平台,可以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体系和生态。建议大力支持平台企业科技创新,鼓励平台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平台经济底层技术和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关键软件等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标志性新成果。

在提升平台企业国际竞争力方面,支持平台企业实现多元化海外布局,依托经贸合作区、数字产业园和海外仓等,培育上下游协同的配套服务生态圈,提升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科技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平台企业的国际化也将有利于文化输出,比如,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对社会经济众多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在移动支付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平台企业出海无疑将有利于扩大这种先发优势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同时,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这篇大文章。数字化转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据过去社会经济周期的规律,这个转型期可能长达数十年。充足的人才供给是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保障。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兼通信息技术和本行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们需要构建涵盖国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等多层面的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未来数十年的转型阶段储备合格人才。在教育上,培养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需求的各类优秀创新型人才,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分类评价体系,构建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引导高校、相关科研机构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新材料等科创高地建设。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进一步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人才激励机制,真正营造物尽其利、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

适度超前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记者: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浙江省委提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应如何继续发挥优势,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梅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始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浙江已经是数字产业化的先行者,接下来,我希望浙江可以成为产业数字化的先行者。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是范式变迁,这是一种在基本观念和实践方式上的根本改变。当前,信息化范式正在发生变迁,信息技术正从助力其他行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转向“主导、引领”角色,对其他行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将带来颠覆性影响。

首先,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主体需要解放思想,转换理念,努力适应信息化引领的时代趋势。当前,我国不少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想、不敢、不会的“三不”现象。“不想”是囿于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对新技术应用认识不足甚至抱有抵触情绪;“不敢”是面对转型可能带来的阵痛期和风险,不敢率先探索,因而就此观望、踌躇徘徊;“不会”是缺少方法、技术和人才,以及成功经验和路径。转型发展必然会面临观念、制度、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其中观念上的转变最为关键。

其次,要适度布局创新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关键核心,一方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设施,以及基于网络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公共服务,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也需要面向互联网进行数字化,形成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能电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化就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前提。需要看到的是,互联网在支撑数据要素市场和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方面的能力和效率还远远不够,数据共享流通成本高,制约了数据价值的释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在互联网之上构建一套“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层,将数据从应用中解耦出来,作为可独立管理的资源,进而把分散在互联网上的数据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实现数据的高效汇聚融合和共享流通,支撑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促进数字经济的高速高质发展。建议浙江在这方面结合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硬”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数据中心等“软”设施建设。

其三,从长期来看,还要不断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力量、积累科技优势资源,这里需要政府有更大作为,事实上作为空间也很大。要更加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有实力有理想民营企业和有条件的社会各方建立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夯实科技创新力量和资源。政府在谋划建设布局大科学装置、科学实验室、大型试验基地等重要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在基础研究力量和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从长期来看,还要不断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力量、积累科技优势资源,这里需要政府有更大作为,事实上作为空间也很大。要更加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有实力有理想民营企业和有条件的社会各方建立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夯实科技创新力量和资源。政府在谋划建设布局大科学装置、科学实验室、大型试验基地等重要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在基础研究力量和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五,从长期来看,还要不断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力量、积累科技优势资源,这里需要政府有更大作为,事实上作为空间也很大。要更加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有实力有理想民营企业和有条件的社会各方建立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夯实科技创新力量和资源。政府在谋划建设布局大科学装置、科学实验室、大型试验基地等重要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在基础研究力量和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六,从长期来看,还要不断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力量、积累科技优势资源,这里需要政府有更大作为,事实上作为空间也很大。要更加注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有实力有理想民营企业和有条件的社会各方建立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夯实科技创新力量和资源。政府在谋划建设布局大科学装置、科学实验室、大型试验基地等重要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在基础研究力量和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新矛盾,检察机关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有效保障者,应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大局,充分发挥集案监督、下访接访倾听、可触可感、源头解纷优势,在及时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上起到积极作用,不断促进社会治理。

以集成监督之势打造共治格局

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以法律监督的“集成性”助力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是上下一体统筹推进。加强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指导,严格落实疑难复杂案件请示报告和重大敏感案件督办制度,做实跟进监督、接续监督和精准治理。二是综合履职全面发展。深化“四大检察”内部监督线索统一管理、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议、综合性办案组等业务协同机制,及时解决刑事、刑民、刑行、民行等“四大检察”互涉问题。三是执法司法多元共治。以府院检联席会议为契机,整合政府、司法、市场等各方力量,建立行刑衔接、联席会议、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汇聚监督合力,增强治理实效。结合工作实际,金华检察机关出台《关于一体抓实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意见》,探索“专业+融合”履职机制,构建“1+3+N”立体管理体系;外部打造“检察+”法律监督格局,在人大代表联络站全覆盖设立检察工作联络点,与政协建立优化营商环境联动监督机制,联合公安打造“一站式”速裁中心,会同法院开展同堂共学“十个一”活动,依托“检察+”协同共治平台,与20余家单位建立行刑衔接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检察履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工作格局。

以下访接访倾听之策消弭矛盾纠纷

坚决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经验检察责任,以更担当答好为民解难的“信访答卷”,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一是畅通倾听渠道,坚决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发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作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动态跟踪提醒与督促办理机制,努力减少程序性事项信访,提高初信初访事项化解率和群众满意率。二是强化倾听政策,不断完善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机制。高效落实领导干部下访督办首办责任,院领导包案化解、信访积案集中研判等工作机制,采取带案下访、重点约访、专题接访等形式,压实包案责任,努力把信访矛盾化解在首办环节。三是抓实倾听效果,全力推动风险防控综合治理。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和公益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定期梳理分析各类风险隐患,落实重大、敏感事项报告制度,促进社会治理问题标本兼治、更重治本。金华检察机关紧盯案件背后犯罪预防、权利保障、公益守护,每年形成一批专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为党委政府当好法治参谋。东阳市检察院“预防化解影视文化产业矛盾纠纷工作法”获评全省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义乌市检察院国际商贸城检察院获评全省首批“枫桥式检察院”。

以可触可感之效优化案件办理

社会治理强调互动性,治理主体是各个机关,感受主体是人民群众,互动性是在效果上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一是惩治与预防并举。通过办案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坚持“严”的震慑不动摇,依法从重从快惩治严重暴力犯罪、重大恶性犯罪,突出惩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另一方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潜在隐患变成现实风险、现实风险变成现实危害。二是实体与程序并重。严格依法、高质效办案本身就是防范化解矛盾风险。在个案证据审查、法律关系梳理、事实认定分析等环节严格审慎,在法律适用和最终处置等方面穷尽手段,最大程度展现法律之良善公正;高度重视程序公正,确保经手的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规范、合法、有据,在办理每一个案件中都严格遵守程序,充分发挥程序的制约、调适与校正作用。三是把释法说理贯穿办案始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听证会、检察开放日等活动,实质性化解案件背后矛盾纠纷,坚决防止检察环节矛盾激化。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已正词严讲清“法理”,又循循善诱讲明“情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源头解纷之智促推诉源治理

一体推进“四大检察”融合履职,综合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多元调解等措施,引导当事人消弭对立情绪、依法表达诉求,源头化解纠纷。一是系统治理强机制。围绕稳妥处理群众信访和注重矛盾源头化解的“两个目标”,打造“风险预防为先导,矛盾处置为主体,领导包案为保障,救助和解为延伸”的工作模式,推动社会治理工作系统性重塑,实现“分层递进、多级保障、多方参与、公开透明”的纠纷解决体系。二是司法救助暖人心。积极探索司法救助与民政救济、社会救助等衔接机制,注重司法救助中信访矛盾化解与实质有效救助之间的关系,做好被救助人的资格审查、立体救助、后续回访,避免“一次救助”后不了了之问题,持续传导司法温度。三是数字赋能提质效。放大数字检察“一地突破、全域共享、迭代拓展”的制度优势和管理优势,走好由浅入深、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共相促进的社会治理改革之路。近年来,金华检察机关持续加强“检察+协同共治平台”建设,深化“个案办理一类案监督一系统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数据共享、机制共建、模型共融,落实省级专项32个,监督成案1376件,4个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数字赋能治理效能充分彰显。

【作者为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推进韧性治理,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吴国干 桑 田

之江青年论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持续提升城市设施韧性、管理韧性、空间韧性。积极推进韧性治理,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管理韧性,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韧性治理的核心特征

“韧性”最初是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中的概念,后逐渐被引入社会科学、城市规划及公共政策等领域,是指个体或组织在面对干扰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承受力、适应性和调节修复能力。这既包括抵御外部环境,尤其是风险环境的耐力,也包括在适应或克服环境压力下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相应地,“韧性治理”是一种旨在增强抵御、适应与恢复能力的新型治理方式,以应对各种内外变化与冲击。其核心特征包括:

首先,韧性治理强调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灵活的状态,即动态平衡的适应性。这种治理模式要求决策者能够快速调整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为了实现这一点,现代化的治理体系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促进不同层级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并不断调整自身状态以适应外部变化。这种适应性还要求治理主体预先具备情境感知能力和战略思维,

能够快速评估环境变化并制定既能满足长远目标又能应对当前需求的策略。

其次,韧性治理注重预防为主、常态长效的综合治理,即目标的综合性。它不仅要处理眼前的危机,还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评估来减少未来危机的发生可能性。这种综合性治理结构需要具备前瞻性,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应急预案和定期的风险评估和培训机制,以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持续稳定地运行。

最后,韧性治理强调多元协同和以人为本的协同治理,即决策的包容性。它不仅要面对技术层面的挑战,更强调全过程民主,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媒体等各方积极参与、相互协调,形成共治合力。包容性的韧性治理要求考虑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和利益,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参与协商沟通。这种多元参与有助于激发社会的组织力和自适应能力,将个人和集体的潜力转化为应对风险的强大韧性。

探索韧性治理的实践路径

浙江在推进韧性治理方面已初见成效。其中,诸暨市成为国内首个联合国“世界韧性示范城市”,丽水市成为首批联合国“创建韧性城市2030行动计划”的人选城市。但从整体而言,浙江的韧性治理仍需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以确保全省在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时,具备更强的适应和恢复能力。

第一,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例如,

浙江的韧性治理可将“建设具备高适应性和快速恢复力的社会系统”设为核心目标,综合“硬设施”与“软制度”两大层面,定位于打造全国领先的韧性省份。这一定位应综合考虑浙江的地理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基础,既要坚持整体推进,又要注重区域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以确保全省各地在面对风险时,能够迅速调整并恢复正常运作。为此,浙江可以考虑成立韧性治理智库,还可与其他省份建立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强韧性治理能力。

第二,开展县域韧性治理试点改革。浙江可考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块为主的县域韧性治理试点改革。目前,诸暨市成为亚太地区第4个被授予“世界韧性示范城市”称号的城市,其经验主要在于关键规划与充分预案,尤其是《诸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诸暨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诸暨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由此带动了浦阳江治理三期、市级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数字孪生技术等方案因地制宜地展开,落实了“MCR2030承诺”(即联合国创建韧性城市2030战略)。这些成熟经验可在我省其它地方展开可复制化的试点。试点改革的地域选择应优先考虑涵盖特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山区,以便在不同环境中验证和推广韧性治理模式。在试点过程中,改革应重点针对以下领域:一是提升组织能力和增强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二是加强城市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城市在灾害中的承

载力和恢复力。三是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确保关键设施在灾害中的连续性与可靠性。四是积极扶持和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水平。五是开展专项培训,提高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的韧性意识和应急管理技能。

第三,注重韧性意识培养。韧性意识的培育不仅是社会韧性治理的一部分,也是修复和改善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首先是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公众培训。可考虑将韧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通过实践课程和模拟演练,培养学生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韧性。同时,开展广泛的公众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的韧性意识,定期在社区和企业组织应急演练,帮助公民在实际情境中提高应对能力。其次是注重社区自治与多元共治。在社区层面,可考虑推广海盐县望海街道“和谐韧性社区”模式,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以解决人员结构复杂、邻里关系疏离等问题。通过社区教育和心理支持项目,形成有效的心理干预和社会机制建设,从源头上化解风险。最后是建立干预机制修复社会关系。建立和完善灾害应对、心理健康、诉讼化解等方面的干预机制,提供综合化的专业支持。在全省范围内试点新的治理方法,探索和推广多样化的治理策略,如公共基础设施的改进和社区合作项目的实施,结合量化评估和恢复性司法措施,推动“枫桥式”轻罪治理体系,积极促进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和谐。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发挥检察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

钟瑞友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